

中国经济发展现况与前瞻^{*}

- 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 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起伏
- 目前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
- 稳住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
- 从总规模来看，在未来 20~30 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世界的最前列

今年（1998 年）12 月正好是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满 20 周年。20 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过去行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逐步转向用经济手段来进行间接调控。初步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沿主要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本文系作者 1998 年 8 月 27 日在台北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座谈会上的讲话。

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1979~1996年GDP每年平均增长9.9%，高于改革前30年平均每年增长6.1%的速度。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相应地使城乡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尤其是近几年呈现出快速稳定增长局面，1991~1996年GDP平均每年增长12.1%，是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在世界上增长速度也是名列前茅。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中国内地GDP在世界各国的排位，已由1991年的第10位，1996年升到第7位。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起伏。最近一次的经济过热，发生在1992~1993年。从1993年夏季开始，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主要是用适度从紧与灵活微调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使经济逐渐降温。GDP增长率由1992年的14%，1993年降为13.2%，1994年降为12.6%，1995年降为10.5%，1996年回落到9.7%。物价上涨率的变动稍微滞后，1994年达到21.7%的高峰，1995年降为14.8%，1996年回落到6%。这样，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1996年底内地宏观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是中外一致公认的。

“软着陆”成功以后，进入1997年，人们起初认为，经济运行已经到了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应该稳住了，或者重新启动。可是1997年增长率除了在上半年第二季度稍有反弹外，全年一路走低。GDP各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速度为：

第 I 季度	I ~ II 季度	I ~ III 季度	I ~ IV 季度
9.4%	9.5%	9.0%	8.8%

1997年全年GDP增长率回落到8.8%，比上年低0.9%；全年物价上涨率由上年6%回落到1.2%。进入今年（199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进一步落到7.2%，第二季度6.8%，上半年GDP增长率为7%，与上年同期增长率相比，下降了2.5%。

市场物价去年 10月起与上年同月相比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上半年物价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1%。虽然国民经济在低通胀和负通胀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是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已经回落到现在国内经济学界公认的当今内地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8%~10%）以下，并且带来职工下岗增多、企业经营困难和金融风险增大等问题。例如，1997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570 万，下岗职工人数达 1200 万，预计今年新增职工下岗人数 300 万，下岗职工总数达 1500 万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库存积压、应收账款等都在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达 1/4，等等。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

这一年半来，内地经济增长速度为何继续逐季放慢？有五个原因：一是前几年“软着陆”过程中经济增长降速的惯性，不能一下子刹住，仍在继续下滑。二是随着体制转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逐渐消失，“买方市场”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三是近几年来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企业关停并转增多，这虽然最终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但近期在企业重组和职工下岗过程中，却带来暂时抑制增长的因素。四是东亚金融风波的影响，包括对内地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五是针对上述现象采取的对策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到位和发挥作用。

内地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后不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就曾经及时提出，对宏观调控“需要适时适度地作些必要的松动微调”的政策建议。其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展到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并影响到全世界，其对内地经济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这种松动微调更是必要的了。事实上，在“软着陆”实施的后期和成功之后，政府已经陆续采取了一些松动金融的微调措施。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对境外金融风波影

响和境内经济走势认识的加深，这些微调措施一步步强化。除了取消银行贷款额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几次降低存贷款利率等外，还特别针对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和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的趋势，推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国内需求等重大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措施发挥作用有一个时滞的问题，而且有些措施如固定资产投资的到位和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未能即时阻止增长速度的下降。上述几项原因也表明，今年上半年能够达到 7% 的增长速度，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是来之不易的。

内地经济目前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表现为有些产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增多，一些生产能力多余而开工不足，利用率只有 30% ~ 50%，等等。这一局面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来由形成的。第一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以排队和配给现象为标志的绝对短缺，被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初步形成相对宽松的买方市场所代替，这是改革的一项成果，在合理界限内供给略大于需求，是为实现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和造成生产者竞争环境所需要的。第二是内地经济生活中因追求速度而产生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经济过热时期的过度膨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扭曲和无效供给。第三是除上述两部分以外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这是真正的“需求不足”造成的。内地经济生活中的局部供大于求，原来主要限于第二种即结构性供求扭曲或者无效供给；近几年来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进一步使供求总量关系向供大于求的方向倾斜；“软着陆”成功后，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境外金融风波影响的显露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需求不足的问题逐渐突出起来。

需求总量是由国外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构成的。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出口

总额增幅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按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2 月为 15.7%，1~3 月为 13.2%，1~4 月为 11.6%，1~5 月为 8.6%，1~6 月增长 7.6%。其中 5 月曾一度出现 22 个月以来首次负增长。虽然 6 月、7 月出口增长下滑的幅度有所放慢，但国外需求减缩的压力仍在发展，一时难以逆转。因此，稳住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是完全必要的。扩大内需也不仅仅是近期为化解境外金融风波的冲击，而且从长期来看，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内地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回旋余地。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像小型经济体那样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而要在充分利用国外市场的同时，把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放在努力开拓国内市场上。

国内需求中的消费需求部分，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生活向小康水平迈进，消费层次的拉开，国内原有的一些消费热点逐渐平淡，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消费市场上过去那种排浪式的购买热潮短期内难再出现。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由于对就业和收入增长不确定的预期以及对福利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个人支出负担将要增大的预期，居民储蓄倾向进一步强化。再加上拓展消费需求所需的一些基础设施条件（如道路、电网）和制度条件（如消费信贷、住房商品化）的整備迟缓滞后，也影响了广大城乡市场的开拓。因此，近期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难以作重大启动。所以，扩大国内需求，首先要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着手，也是顺理成章的。

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投资本身直接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而且通过投资的乘数作用，创造倍加的需求，所以是当前治理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的最有效药方。随着政府关于增加对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扩大内需措施的逐步落实，今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出现加速的势头，第一季度同比增

长 10.3%，上半年同比增长 13.8%，比第一季度提高了 3.5%；1~7 月增长 15.6%，比上半年高出 1.8%。照此趋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达到 20%。这对于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将起决定性作用。重要的问题是这次增加投资的方向，不能再在一般加工工业上搞盲目重复建设，而要重点加大基础设施薄弱环节投资的力度。按照政府最近的安排，增加的投资要定向用于公路、铁路、电信、农田水利和生态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和粮库建设、经济实用住房建设等。增加投资还应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目前中国内地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另一方面劳动力本身的资源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应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逐步增加机电工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以推动技术升级，并增大对可采用大量新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以利于解决劳动就业问题。

扩大需求的重点放在增加投资和扩大内需，当然并不意味着放弃刺激消费需求和促进外贸出口的努力。除了尽可能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外，正着手采取发展消费信贷，建立覆盖全国的容量较大的供电网络等措施开拓城乡消费市场；还要加快和调整住房制度、教育收费制度、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以稳定居民的心理预期，增强其消费倾向。在外贸出口方面，我们已承诺稳定人民币汇率，所以扩大外需要用非汇率的手段，诸如增加出口退税、提高出口商品质量、降低出口成本等。实行多元化贸易战略也是一项重要措施。今年上半年虽然对东亚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国家的出口下降，但对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出口均有较大增长，这对实现上半年出口增长 7.6% 作出了贡献。

“软着陆”成功以来在宏观调控上陆续采取的一些松动微调

措施，主要是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但近年的实践证明，在目前情况下依靠银行贷款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已不如过去那样有效。去年和今年中央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存贷利率，市场反应并不明显，正是说明了目前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方面的局限性。原因何在呢？一是银行商业化改革中更加重视贷款质量，出现“惜贷”现象。二是企业改革中自我约束有所加强，投资决策趋于谨慎。三是利率下调的幅度低于物价下降的幅度，致使真实利率提高，企业盈利前景不佳，暴利机会大减，总觉得找不到好项目。四是这次扩大内需主要靠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中有许多项目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的特点（有社会经济效益，但投资者不能得到直接回报），这部分投资很难通过降低利率扩大信贷的方式来刺激，而宜于由政府提供资金和由政府贴息的贷款来进行。所以在运用货币政策的同时，更要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增长。目前内地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在 10% 左右，支持经济的实力不足。最近政府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采取适当增发国债的办法向银行和社会吸收资金来支持对基础设施投资。据测算^①，1997 年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约为 17.5%，低于国际公认的控制线的上限；国债余额占 GDP 比重的国债负担率只有 5.89%，扩大国债发行的余地更大。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原定于 20 世纪末基本消除财政赤字的任务。推迟实现这一任务，甚至短期内让赤字有所增长，是可以暂时容忍的。但这件事既要克服近几年来形成的社会上和立法机构内人们厌恶通胀、反对赤字的认知和情绪，同时又要防止过去的经济过热时期流行的“赤字财政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观点的死灰复燃。鉴于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当前

注：参见《中国经济时报》1998 年 8 月 7 日第 5 版。

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的松动政策时，也必须注意适时适度，在坚持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下进行，以防止一哄而起，搞盲目重复建设，生产积压产品，给后续经济发展重新带来过热膨胀的恶果。

今年以来，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内地经济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但要完成全年 8% 的增长目标，在今年夏季国内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和下半年东亚金融危机前景难测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也存在有利条件：一是目前交通、能源、原材料供应、外汇储备、通胀率等，是多年来最为宽松的，都可以支撑 8% 以上的增长。二是政府政策明确由降速转向保速，由限制投资转向鼓励投资，由主要抑制通胀转向着重解决就业问题。三是各级地方的积极性大，各省市增长目标都定位在 8% 以上，只要给予政策，不难启动。我认为，随着扩大内需一系列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见效，速度下降的趋势将逐渐稳定下来，今年第四季度明年上半年将出现回升。内地经济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还是结构和效率问题，如果抓紧目前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致力于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那么增长速度即使暂时下来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从长期来看内地经济的发展将置于更加坚实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认真实行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根本任务。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两个 10 年的 10% 左右的高速增长，今后能否继续保持这一增长态势？议论颇多，看法不一。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以日本、韩国等国为例，认为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发展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今后内地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入正常增长阶段。另一种看法从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市场容量拓宽潜力、高储蓄率的资金潜力、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潜力等方面，以及从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将为内地提供持久不

衰的发展动力，认为中国今后仍可有 20~30 年的高速增长。双方论点各有一定道理。对中国内地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测算，则因采用计算方法、折算口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但不论采用哪种方法，都认为从总规模来看，在未来 20~30 年，中国内地经济将走向世界的最前列。但即使总量达到世界首位的时候，人均水平仍然较低，其他许多质量指标仍然落后，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地区的水平。邓小平提出到 2050 年初步实现现代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战略估计。中国人多地广，发展很不平衡，这是困难所在，又是潜力所在。中华民族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最短的时期内，完成现代化的任务。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及政策取向 若干问题的看法*

- 要客观地认识当前经济形势
- 要科学地看待 8% 增长目标
- 启动经济要立足于中长期发展格局，注意历史经验
- 实行轻度通货膨胀政策，还是坚持物价基本稳定政策？
-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要适时适度
- 产业结构问题

* 本文系作者 1998 年 9 月 11 日在国务院研究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发表于《江苏通讯》1988 年第 3 期。发表时该刊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国务院研究室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对当前经济形势及政策取向问题发表了六点看法。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指出：“刘国光同志的文章观点明确，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是一篇好文章。”

一、要客观地认识当前经济形势

对今年（1998年）形势变化，我4月曾在社科院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对增长速度下降分析过几点原因。其中一点是：虽然宏观调控的松动措施已出台不少，但还有个力度和时滞的问题。随着各项措施逐步到位，速度下降的趋势将会逐步稳下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会出现回升。几个月来国务院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刺激需求的力度，现在看来已初见成效。一些预示经济周期运行的先行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存款、银行贷款和一些投资性产品，如钢材、水泥等都在回升，加上目前财政1000亿元和银行的1000亿元投入，对四季度和明年经济肯定会有推进。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正确的，也符合矛盾暴露和认识的过程。对问题，总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十五大报告时就没有讲东南亚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因为那时影响尚未显现。物价总水平的负增长也是从去年10月以后才出现的。今年年初有人说，我们早就提出需求不足，现在才认识一致；指责抓晚了两年，即1996年初就应抓扩大内需。我认为1997年第四季度需求不足的问题才开始比较突出，此前还不能说是需求不足。如果两年前就需求不足，就不要搞什么“软着陆”了。这次“软着陆”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听这些“先见之明”。我认为，整个政策制定和实施，大体上是符合矛盾发展暴露过程和认识过程的规律的。

二、要科学地看待 8% 增长目标

年内经济增长速度肯定要回升，但能否达到确保 8% 的目标？年初提出确保 8%，有鼓舞信心和士气的重要政治含义，是很必要的。并且有个 8%，各方面的安排都好办一些。但没料到今年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和内地洪灾这么严重。1~8 月，工业增长 7.8%，由此推算 GDP 增长约为 6.9%；三季度要达到 8%，这不容易；而四季度 GDP 必须达到 10% 以上，全年才能达到 8%，这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难度很大。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不必过于追求 8%。否则，一会助长虚假风气，促使下面虚报成绩。二会助长“大干快上”，出现过于集中的投资热。三会引发后年、大后年的过热。如果四季度达到 10%，明年起点很高，后续影响怎么办？四是今年如有 7.5%~8% 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体面的。海外人士怀疑我们的 8% 有水分。美国《时代周刊》预测我们只有 3%，这当然是瞎猜。但是今年以来一些实物量指标（如发电量、能源、货运量等）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明显偏低，现在各省报的数字综合起来高于 8%，这些情况也要研究核实。我主张现在在保 8% 上要注意灵活性。即使达不到，也没有关系，应强调两个因素：东亚金融危机和水灾。还要强调，中国当前经济问题主要还是结构、效率和环境问题，而不是速度问题。

三、启动经济要立足于中长期发展格局 注意历史经验

过热时要防止“硬着陆”，过冷时要防止“硬起飞”。我们获得了“软着陆”的经验。现在是否通货紧缩？领导同志讲话中肯定了这一点。连续 10 个多月的物价下降，可以判断为轻度的通货紧缩了。我们也有治理紧缩的教训。上次经济周期谷底 1990 年 GDP 增长 3.8%；1991 年启动，达到 9.1%，上升了 5%；1992 年又大上，达到 14.2%，又上升了 5%，两年升幅这样大，结果出现过热。这次情况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对扩张性政策，企业和消费者的反应都是很快跟进。这次由于机制原因和市场原因，企业投资需求和消费者购买需求的跟进，都不会如过去那样迅猛反应（经济学意义的“乘数”变小）。所以，GDP 增速在今年预计在 7.5%~8% 的基础上，明年达到 8% 就很不错了。

对明年增长有三种估计。第一种是 8%~10%。第二种估计是如果今年一定要确保 8%，四季度就会达到 10%，明年将会超过 10%。第三种估计是明年国际经济紧缩的大形势不好，对我国经济影响更加严峻，这样明年增长可能达不到 8%。显然，启动经济要考虑明年和更远。根据历史经验，我国经济增长率从低谷上升的持续时间平均为 2.1 年，下降时间平均为 2.5 年。启动后经济增长率上升没有超过 3 年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启动太快，幅度太大，“大上”必然导致“大下”。那么，这次启动，能否把上升时期延长一些（如 4~5 年），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总之，启动经济不能只看到当前紧迫需要，而要着眼于较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防止盲目大上、重复建设：否则带来物价猛

涨，又会出现全力扑灭通胀之火的局面。所以，我很赞成现在实行扩大内需所持的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最近财政部发言人讲，现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中长期适度从紧政策基础上进行的短期调整，这是很正确的。

四、实行轻度通货膨胀政策，还是坚持 物价基本稳定政策

迄今物价总水平的下降已持续了 10 个多月。价格下降影响生产者信心和消费者预期，反映了经济不够活跃，不利于启动经济。鉴于此有人提出：应实行轻度通货膨胀政策，让物价持续小幅（比如 5% 以内）上涨，来刺激经济增长。对此需要商榷。我认为价格政策还是要提基本稳定为好。高通货膨胀肯定不行，这不多说了。低通货膨胀好不好？首先要问什么是“低通胀”？前几年有人拿拉美和原苏东地区的高通胀做参照系，说我国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物价上涨是“低通胀”。即使把价格总水平上涨 5%，算是低通胀，但从现在的负 2% 到正 5%，实际上将上涨 7%，幅度并不低。而且“低通胀”很容易滑向“高通胀”。通货膨胀不论高低都会使结构扭曲，不利于刺激技术进步，助长过度投机，加剧分配不公。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当然，持续的物价下降即通货紧缩也不好，因为它易于使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看淡，失去信心。但从历史上看，一定的通货紧缩与经济发展并不总是矛盾的。19 世纪 70~90 年代美国就出现过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货紧缩并存的情况。价格下降对新兴产业和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不仅前美国华尔街日报有一篇题为《通货紧缩没有什么可怕的》文章说，“通货紧缩也许会损害旧行

业，因为它将迫使生产者降低价格以消除生产能力过剩现象，但却不会影响创新的技术领域，因为价格的下降将促进需求和技术的蓬勃发展。现在所面临的是主要由于供应过剩而造成的通货紧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起好作用的通货紧缩。”在我们目前同一出现的轻度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作斗争时，上述从历史角度提出的看法也是值得思考的。

我之所以在此插入上述议论，是想指出，不要认为价格总水平上涨是刺激增长促进进步的不二法门，价格总水平下降对经济发展也可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通胀和通缩这两者的弊端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不赞成实行“轻度通货膨胀政策”的主张，而赞成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主张。“基本稳定”当然不是绝对不动，而是环绕一条合理的趋势线（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而异）上下微动。一旦出现持续上升的“通胀”或持续下降的“通缩”，就应启动微调措施予以调控。这样的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政策，能够稳定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和信心，有利于刺激技术进步，杜绝过度投机，减缓分配扭曲，并为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应成为当前我国调控物价总水平的一项基本政策。

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要适时适度

今年年中提出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得很及时，货币政策要配合财政政策，但没有提积极的货币政策。上半年人们就在议论，货币政策是否失灵了？财政政策启动内需更直接、快捷、有效。这种观点似乎有理，但不深入。说货币政策不灵的主要根据是对银行几次降息，企业反应不大。其实，以前经济过热

时，不少企业对升息的反应也不大，这里面有一个企业机制和市场机制转换尚未到位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货币政策失灵了。货币信贷供应量的调节也不是只有调息一种手段，还有利息以外的多种手段。说银行过分“惜贷”，也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近几个月来，银行贷款，企业存款都在回升，特别是随着投资力度加大，基本建设投资贷款在很快回升。还有不少经济活动的刺激不能只靠财政，主要靠货币手段。所以货币政策也要积极运用。财政手段可能更快一些，但减税增支和发债总是与赤字的扩大相联系的。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闲置资源（包括资金、劳力、设备能力、物资材料等）的情况下，赤字财政是可以容忍其存在甚至扩大的。比如，目前储蓄大于投资、银行资金存大于贷，在此情况下，财政用发债方式向银行借 1000 亿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没有危险的。但是，社会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随着经济扩张的进行，迟早资源瓶颈会一一出现。况且财政性扩张还要同时考虑信贷扩张的需要而不能挤掉后者。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有限度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要适时适度，否则财政赤字会超过承受能力，引发通货膨胀。所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绝不等于接受时隐时现的“赤字无害”、“通胀有益”的论调，同这类观点严格划清界限，是必要的。

六、产业结构问题

最近，为扩大内需而新增的 2000 亿元投资限定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搞加工工业。这对防止重复建设、增大过剩能力和积压库存，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在这 2000 亿元之外，加工工业还是要搞的。因为：第一，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要依靠技术进

步，加强技术改造，首先要对机电设备等装备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这些都与加工工业分不开。第二，解决就业问题，需要发展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这也与加工工业分不开。如何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使之既能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要求，又能缓解城乡人口就业的压力，是当前经济启动和今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促进技术改造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中央很重视。但政策力度和落实还不够，还要继续强调。